

石渠閣議之經學史上意義

——樹立「稱制臨決」典型與經說分化的開始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Great Discussion on Confucian Theory at *Shiqu*-Hall in Western Han Dynasty.

李康範

韓國 中央大學中文系

摘 要

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始作稱制臨決，後如白虎議奏等競效之。此獨尊儒術後之不朽之盛事也。召石渠閣議由於經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門戶繁多，舉賢良文學與博士又增倍之，是以又需歸一統之故也。孝武卒用董生，雖戾太子兼善穀梁，穀梁仍告衰。後其孫孝宣聞太子好穀梁，遂勵而興之。如此績十餘歲，待皆明習，乃召諸儒平公·穀異同，終穀梁大盛。然則孝宣為何如此酷好穀梁？盡孝戾太子亦可謂其因之一，但孝宣少時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又忌昌邑而懼之，是以遂選利於己之穀梁，悉用穀梁儒生以解決繼承宗法之難題。此形勢之所然也。太子請用儒生，孝宣作色而歎，孝宣實非儒家。稱制臨決已定，師法分為家法亦實由於石渠。石渠成經傳之神聖，然或壞政統與道統之抗衡，此乃其弊也。

關鍵詞：石渠閣議、稱制臨決、宣帝、春秋穀梁傳、戾太子、博士、昌邑王、家法

一、前言

兩漢是展開經學大討論的時期。在筆者看來，西漢與東漢時期展開的幾次今古文論爭，可以說是皇帝與大臣（或學者）在宮廷中可能施行的一種最理想的統治行為。屬於同一學派的學者相聚一處，對自身的學說進行補充和修正，為準備如何對應另一方對自身漏洞的攻擊——「問難」不斷進行模擬討論，使自身的學說更加嚴謹。然後在宮中舉行的「正式競技」中雙方各派出一名學者進行激烈的論戰。皇帝親臨現場，發表自己的觀點或進行仲裁，最後導出一個個結論。旁邊則由當代最高的學者對此過程進行詳細記錄。中國古代歷史上這樣的學術盛會可以說是筆者所心馳神往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則為東漢章帝時期在白虎觀舉行的討論會，對此《後漢書》記載道：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¹

當然，如此熱烈的討論正如班固所指出的，不免學者們為「祿利之路然也」的一面，即為了確保自身所屬利益集團已獲得的權力，進而奪取對方的文化權力，分享其利益，互相為「飯碗」而進行的一種明爭暗鬥。但隨著經書解釋的準確性和客觀性成為討論的主要標準，雖無法完全脫離某種政治的考慮，至少在表面上，倫理與道德被視為首位，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其純粹學術討論的性質。

可無論皇帝如何英明，賦予其超越了政治的對學問的裁決權，這種做法正確與否則有待商榷。儒家經典的「解釋權」原本屬於士大夫，皇帝並不具備獨佔的「超能力」。同時會帶來以高壓的政治框架來束縛學問及思想的弊端。由此，由皇帝來參與的這樣一種討論會不免存在諸多的問題，未必是完美的討論會。即使在將民主和輿論自由視為社會首要條件的今天，也往往可以看到統治者的個人見解及簡單的一句話都可能成為決定一個政策的不可動搖的「最終決定」。由此，我們可以充分想像出被「天子」莫大的權威所壓抑的氛圍，學術由於自我監禁而無法得到自由的發展。

¹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137-138頁。

為了更好的理解經過兩漢時期幾次的今古文論爭後典型化的中國初期經學發展的全貌，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在石渠閣展開的討論，即「石渠閣議」。在概況兩漢經學史時，石渠閣議不僅可稱為正式展開經學論爭的肇始，同時在形式與過程上創立基本的框架，為後世打下了基礎，樹立了論爭的典範。考慮到將文學掌故置於君側，如此重視前例的古代中國的慣例，石渠閣議的意義則顯得更為重大。²同時，石渠閣議創下了一直延續至清代的，皇帝獨佔經學解釋權的先例，這一點也非常值得重視。

表面看來，石渠閣議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即在西漢的第 7 代皇帝，孝宣皇帝劉詢時期，將諸儒聚集於類似於圖書館的石渠閣，討論五經的異同。最後，將一些經傳補充設為學官。其中尤其是由專攻公羊學與穀梁學的儒生對其長短展開了論爭，並且皇帝親自參與討論，最終設立了《穀梁春秋》等博士。本稿將重點來考察後者。

石渠閣議不僅為經學思想，同時也為統治理念的樹立打下了基礎。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過去的經學史上卻未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拋開「門戶之見」，始終堅持客觀性論點的馬宗霍在《春秋公羊傳》及《春秋穀梁傳》為例，談及漢代經學的齊學及魯學的區分時，只引用了宣帝時期學者們的對話，而絲毫沒有言及石渠閣議。³皮錫瑞等所著述的其他重要經學史也完全或幾乎沒有談到。考慮到「石渠閣議」對後世的影響，後人顯然沒有充分認識到此次論爭的重要性並且過於忽視。⁴由此，本稿將考察石渠閣議的發端經過及結果，以及對後世經學及學術思想的影響，以期對石渠閣議在經學發展史上所佔的地位給予比較客觀的評價。

² 臺灣的歷史學者邢義田指出，律令·故事·經義為漢代行政的 3 大標準，尤其是故事為西漢開國之後所發生一切事例的集大成而受到重視。詳細內容參考〈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年），334-336 頁。

³ 馬宗霍在《中國經學史·第六篇兩漢之經學》（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中兩次談及宣帝的公羊與穀梁的討論，卻沒有言及或評價石渠閣議。參考 38、46 頁。

⁴ 參見 40 年代的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上）（臺北：中文出版社，1979 年）、夏長樸：《兩漢儒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8 年）、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年）、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之〈石渠閣會議與穀梁春秋的興起〉。韓國的研究成果乃是李世東為代表，〈石渠閣經學會議에 대한 一考察〉《中國語文學》（Seou：第 43 輯，2004 年 6 月）等有不少成果，其中金容天的研究較多，主要集中於禮學爭論。〈前漢宣帝時代의 禮論論爭과 後代의 禮學的 평가〉《新羅文化》（Seou：第 28 輯）、〈漢宣帝期禮制論議〉《東國史學》（Seoul：第 33 輯）、〈石渠禮論의 分析과 前漢시대 禮治理念〉（《東方學志》）等，還有金東民：〈公羊學과 穀梁學의 대립을 통해 본 漢代春秋學의 성격〉《韓國哲學論集》18 輯（Seoul：2006）分析說明經過石渠閣會議，穀梁學如何成為顯學的經過。

二、石渠閣議的背景及過程

(一) 石渠閣議的背景

漢武帝將儒學確立為統治理念之後，儒學逐漸成為思想與學術的中心，同時開始影響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陰陽與性情相並列，五行與五常相並列，以天人相應為理論基礎，顯示了君主的權威，樹立了與制度法律相應的儒家思想體系。儒家上升為漢代國家統治理念的過程中非常鮮明的特色之一即為有關國家施策的大型討論會的舉行。經濟方面以統治形態與意識形態為主題的討論為其中之一，另一個即為有關學問政策方針的討論會。前者為西漢昭帝始元 6 年召開的 (B.C.81) 所謂「詔有司問群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⁵的「鹽鐵會議」。宣帝甘露 3 年 (B.C.51) 的「詔諸儒講五經同異」⁶即「石渠閣議」則為後者。旨在調整經濟政策與學問路線的兩次討論，體現了西漢時期社會的活力，成為典型的「前代之故事」，對後世起到了很大的影響。「鹽鐵會議」與「石渠閣議」兩次討論都得力於漢武帝在元朔 5 年「百家罷黜，獨尊儒術」⁷政策的實施才得以舉行。即漢武帝「百家罷黜，獨尊儒術」國策的實施，一掃了先代文帝、景帝以後直至武帝青年時期在長安佔主導地位的道家思想，顯示了儒家的勝利，同時為學術帶來了新的轉機。當然，漢武帝以前也曾有過論爭。可當時的論爭並不代表哪一個學派，而是針對所發生問題的一種個人色彩較濃的論戰。但其中蘊含著重要的啟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為武帝的父親景帝時期，代表儒家的轅固生與代表道家的黃生之間展開的有關「湯武受命」到底是叛亂還是接受天命的易姓革命的論爭。⁸

⁵ 《漢書·昭帝紀》(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223 頁。鹽鐵會議的中心可以總結為，要強化中央集權之官僚與強調民權之在儒生之間的爭論，主要議題為教化與法制、重農與重商，尚德與尚力等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間一些問題的爭論。最後依賢良與方正的主張，廢除了郡國的專賣以及關內的鐵官，又終止了與匈奴的戰爭。可以解釋為一種儒家思想對君主專制制度的制約。由此，道德與倫理成為了制定法律與國策的前提，儒家成功地將自身的價值觀念與義的準則提升到了一個絕對的高度。以倫常為核心的思想具有了調節與統合法律政策的張力，矯正了秦漢時代吏治與法制過度苛刻而造成的社會緊張局面。

⁶ 同上註，272 頁。

⁷ 關於為「百家罷黜，獨尊儒術」公孫弘的奏請詳見《漢書·儒林傳》，3593-3596 頁。

⁸ 隨著論爭逐漸擴大，甚至涉及到漢建國的正統性如此敏感的問題。立場極為尷尬的景帝言「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將事態遮掩了過去。由此迴避如此一類敏感問題成為一種不成文的規則。這一有名的插曲因個人論爭的色彩較濃，本稿主要是考察儒家各學派間的論爭，因而沒有論及。但章權才認為此次論爭在學術思想史上意義重大，附記於此。詳細內容參見《史記·儒林傳》，3123 頁及《漢書·儒林傳》，3612 頁，其內容基本一致。章權才對此的觀點詳見《兩漢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92 頁。

漢武帝以後，儒家內部各學派間的論爭不斷。為了理解石渠閣議的背景，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漢武帝將五經博士正式設立為學官這一時期的明顯變化。一種思想與統治理念剛剛出現時，其結構往往較為簡單，但隨著對被奉為經典的經書解釋的多元化而逐漸變得複雜，這可以說是一種必然出現的現象。

武帝以後，博士與博士弟子員的規模出現了明顯變化，短時間內其數字迅猛增長。博士弟子員在武帝時為 50 名，昭帝時增加到 100 名，宣帝時則又增加了兩倍。⁹這種變化不僅表明人員的增加，同時意味著經說的豐富與多元化。即各種經說由「多樣」發展到「雜駁」氾濫的狀況。雖為實現思想的統一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開始實行在博士弟子員中選拔任用郎官的政策後，現實的「祿利之路」的影響明顯起到了更大的影響。這些位於學問頂峰的博士們為了擴大自身學問與政治方面的影響力，盡力去爭取一個「大師」的名銜。隨之，講義的內容也變得越來越複雜，教材也逐漸有別於其他學派。這一點正如班固所指出的「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¹⁰

由此，不管是朝廷或官吏機構都感到有必要對如此複雜的經說進行一下綜合與整理。隨之博士官內部的變化，社會也需要思想方面的重新調整。對這一變化章權才認為，武帝與宣帝時期，豪族的勢力逐漸加強，同時官僚集團與以竇氏為首的外戚也不斷擴張其權力範圍。此時，研究經學的儒生們隨著朝廷獎勵政策的實施，其影響力也日益提升。同一導師指導的同門，或研究同一問題的經學者們由於其利益是一致的，很容易相互團結利用甚至壟斷仕途。其間經常會出現與既得利益集團官僚相勾結的情況，逐漸為了自身的利益，打著豐富經說的旗號，創立「雜駁」的各種分枝。即經過「枝葉蕃滋」的過程後，自然地形成了許多集團化的門戶。其結果，與朝廷所期待的正相反，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分裂，促成了對思想再次進行調整的必要。¹¹如此，經學日益昌盛，儒家對經義的解釋逐漸趨於複雜。同時士族與豪族的勢力不斷增強，造成經學解釋不斷分化。以上兩點可以說是石渠閣議成立的政治社會背景。下面我們來具體考察一下石渠閣議成立的過程。

⁹ 此外昭帝時 100 名的博士弟子員到了成帝末增加至 3000 名。不過 4 代皇帝之間數字變化極大。「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漢書·儒林傳》，3596 頁。

¹⁰ 《漢書·儒林傳》，3620 頁。

¹¹ 章權才，《兩漢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95 頁。

（二）石渠閣議成立的過程

當時，距離今古文成為論爭焦點的西漢末年還有很長一段時間。這一時期爭論的中心集中於今文經學內的《春秋》學。漢武帝時期，關於《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優劣的討論具有代表性。對今文《春秋》傳的論爭在《漢書·儒林傳》中如此記載道：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¹²

以上是在講，論爭中由於江公不及董仲舒，因此董仲舒所專攻的《公羊春秋》被確立為學官，這完全是通過論爭判別出學問的優劣後所得出的結論。江公的辯論不如董仲舒雖為事實，將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設為學官的原因並不完全在於此，對《春秋》的解釋，即綜合經義優劣的結果是《公羊春秋》占優勢的更根本的原因。此外，以公羊學為本的丞相公孫弘的支持，與皇帝的尊重等政治的考慮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其中仍然不免學術機制參與其中。後來，太子重新又把目光轉向了《穀梁》。

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¹³

有必要對這裡所提及的太子進行補充的說明，這個問題將在後面具體介紹。雖然太子私學了《穀梁春秋》，但隨著時間流逝，穀梁學逐漸開始衰退。武帝之子昭帝後，穀梁學漸漸脫離萎靡狀態，隨著魯出身的榮廣的登場而出現了轉機。與皓星公一同傳授《穀梁春秋》的榮廣在與當時最高的公羊學大家眭孟的論爭中取得了勝利，學習穀梁學的學者逐漸增多，顯出了活力。榮廣與皓星公最優秀的弟子為沛出身的蔡千秋，他作為一名卓越的學者在《穀梁春秋》傳授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¹⁴

以上為宣帝繼位前的情況，學問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大致可以視為純粹學問發展的過程。但宣帝繼位後情況有了極大的轉變。

¹² 參考《漢書·儒林傳》，3617頁。

¹³ 同上註。

¹⁴ 對此過程《漢書·儒林傳》說明道：「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漢書·儒林傳》，3617-3618頁）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¹⁵

宣帝繼位後，今文春秋學內部發生了巨大的變動，明顯呈現出了經學的區域性構圖。以振興自身出身地域為目的的魯國官僚的進言，暴露出了極強的受害意識，即武帝以後政治與學問方面一直被公羊學所代表的齊學派所壓抑，處於弱勢地位。魯學與齊學的差異戰國末期已逐漸鮮明化，並未呈現出對立的局面。而從這一時期開始則表現出一種帶有感情色彩的對立傾向。從另一個側面可以說，這是以地域為核心的學術主導權與政治利益相連接，打著學問的旗號進行的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從以上宣帝只向魯國出身的官僚提問也可以看出宣帝的意圖何在。此後，宣帝按其所言，開始採取一系列大力獎勵《穀梁》學的措施，引文中出現的蔡千秋成了中心人物。其獎勵措施如下：

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¹⁶

班固沒有指明與蔡千秋展開論爭的《公羊》學家。這大概是由於皇帝的傾向十分明顯，因而沒有指出到底是誰。皇帝不僅獎勵穀梁學，還憂慮該如何對其進行傳授。皇帝如此作為的原因，表面上是因為聽說衛太子喜愛《穀梁春秋》，自己也開始喜愛《穀梁春秋》，而對穀梁學進行了獎勵。但皇帝的一切決定甚至是個人喜好離不開政治意圖，將哪一經設為博士官並不是簡單的問題。〈儒林傳〉的記載明顯表明皇帝此舉並非出自於毫無政治意圖的感性判斷。如此的傳授過程繼續了十幾年之後，終於石渠閣議大討論會得以舉行。這出於宣帝個人的意圖（雖畢竟是政治性的）與公的意圖。下面具體考察一下石渠閣議的詳細內容。

¹⁵ 《漢書·儒林傳》，3618頁。

¹⁶ 同上註。

三、舉行石渠閣議的目的、動機及影響

(一) 舉行石渠閣議的目的

如上所述，經過十幾年後皇帝判斷《穀梁》學已經廣為人知，於是終於在宣帝甘露3年（B.C.51）決定舉行大討論會，即石渠閣議。其經過〈儒林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¹⁷

此外，關於石渠閣議的記載出現在《漢書·宣帝紀》的甘露三年條，但與「儒林傳」比較起來內容不夠詳實也有出入。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¹⁸

〈儒林傳〉記述的重點為《公羊》與《穀梁》論爭的焦點問題，〈宣帝紀〉記述的中心為石渠閣議最終的結果。但兩段文章均未使用石渠或石渠閣議的字眼，不禁令人疑惑。專攻其他經的12名學者的傳記後面附有「以博士論石渠」，「論於石渠」，「論石渠」等，這表明這些學者均參與了石渠閣議。因為在《公羊》與《穀梁》學者間的論爭中找不到石渠的字樣，容易讓人產生這裡記述的是與石渠閣議無關的其他論爭的錯覺。同時通過記錄我們無法知道包括蕭望之的參與《公羊》與《穀梁》討論的11位學者是否參與了其他經說的論爭，也無法判斷針對各經是否進行了個別的討論會，這方面的資料也無從獲得。

¹⁷ 《漢書·儒林傳》，3618頁。參加石渠閣議的儒生的名單，《公羊》與《穀梁》如所引用的內容各列出5名，其他經書如《漢書·儒林傳》則散落在各論之中。人物介紹之後附有「論石渠」，或「論同異於石渠閣」等文章，參與的學者共22名。參與各經的學者如下：《易》：施讎、梁丘臨，《書》：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詩》：韋玄成、張生、薛廣德，《禮》：戴聖、通漢等。章權才：《兩漢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96頁。劉宗賢、謝祥皓：《中國儒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74-175頁也載有名單，可經對照確認極不準確。

¹⁸ 《漢書·宣帝紀》，272頁。

綜合以上兩段文字的內容，我們可以把石渠閣議的目的進行以下整理：第一，「講五經同異」。但這裡明顯更傾向於求「同」。可以判斷其目的在於從經書中尋求思想與學問共同的原則，並試圖讓所有人接受。這對於統治是極為重要的預期目標。第二，「各以經處是非」經學的實際效用集中於如何適用於現實政治，想要得到「是」的判斷一定要得到為政者的同意與崇尚。如此，上述的「議 30 餘事」的標準乃為獲得了皇帝認可的《穀梁》的經義。其結果，《穀梁春秋》也作為春秋學的一派，其地位得到了鞏固。可宣帝為什麼會如此欣然同意並大力支持不禁令人感到疑惑。

(二)、舉行石渠閣議的動機

1. 個人動機

宣帝長期獎勵《穀梁春秋》，最終舉行石渠閣議，這一系列的過程均始於「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同時我們有必要注意一下大討論會舉行的動機。宣帝為這次討論會的舉行可以說是進行了極為充分的準備。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首先說明有關衛太子此人的身分。衛太子為何許人也？只讀文章我們很容易誤認為是宣帝的太子，可其實是指自己的爺爺戾太子。¹⁹即曾祖父漢武帝的初戀衛子夫所生的大皇子劉據。劉據很早被冊封為太子，但被冤枉參與江充的巫蠱之變，後來遭到父親武帝的軍隊追擊後自殺而亡。這一事件還導致了其妻子史良娣與兒子史皇孫，媳婦王夫人被處死，唯獨史皇孫的兒子戾太子即孫子劉詢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他一直隱姓埋名生活在民間，後來長成後登基繼承了皇位。²⁰與其他皇家所不同，曾遭受滅門之禍的宣帝做了皇帝后自然會懷念起含怨而死的祖父戾（衛）太子。如此聽說爺爺喜好《穀梁春秋》，為了化解心中的抑鬱之情表達孝心而大力獎勵《穀梁春秋》，長期籌劃舉行石渠閣議，這種解釋是行得通的。漢代皇帝諡號的前邊均加有一個「孝」字，如「孝武皇帝」，「孝宣帝」等。這表明孝為當時最高道德標準之一。在權謀的使用上並不亞於其他人的宣帝，是想通過顯示自己的孝心而試圖獲得政治上的利益。

¹⁹ 衛太子是隨其母衛子夫即衛皇后的姓稱呼的，諡號戾太子為其正式的名字。《宣帝紀》注中，將韋昭的「戾」貶低為「以違戾擅發兵，故諡曰戾」，臣瓚則認為宣帝不可能使用帶有貶義意味的諡號，由此接受董仲舒做出的「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無其功有其意謂之罪」的解釋。參見 235 頁。

²⁰ 太子不得已參與叛亂的經過及結果，其家族的悲劇以及作為武帝的曾孫登基的宣帝所採取的措施等詳細記載於《漢書·武五子傳》，2741-2749 頁。詳見《漢書·宣帝紀》，235-236 頁及〈外戚傳〉，3949-3950 頁。

以上內容正史均有所記載，後代的史家及注釋家對此也未提出過任何異議，可見其客觀性。但即使皇帝盡其孝心，討論會亦「圓滿」結束，我們只根據這些來推測皇帝的實際意圖及石渠閣議學術方面的意義則顯得不足。因為這些均屬於政治行為，我們還需要做進一步分析。

2. 政治動機

古往今來，皇帝作為國家元首，他的每一個舉動都含有政治的意味。正如周公曾教導過「天子不可戲」。²¹傳統社會裡的皇帝習慣性地對自己的一言一行進行政治利益上的衡量。宣帝為學者皆熟於《穀梁春秋》，苦心等待十幾年，顯示出他非常老練的政客的一面。他曾隱姓埋名生活於民間，與其他皇子比較起來更能看到生活的陰暗面，加上他天生的品性，在政治方面則更加敏感。關於宣帝的青年時期，《漢書·宣帝紀》記載道：

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馮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²²

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坎坷均成為了他後來統治國家的基礎，這對他本人是一種幸運。宣帝為表達對冤屈死去的祖父戾太子的孝心而獎勵《穀梁春秋》，但這只能看做是其中比較小的一部分，而不能排除他這種做法是出於政治目的考慮的可能性。

宣帝深謀遠慮，最終決定舉行石渠閣議，他的政治目的究竟何在呢？至今我們無法獲得最直接的資料，想了解其全貌有很多困難。但綜合宣帝成長與登基的過程及在宮中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歸結於皇位正統性的問題。現代學者金春峰對石渠閣議中《穀梁春秋》被設立為學官這一結果的政治意義分析道：

公羊學雖也強調宗法等級制度的建設，但公羊春秋突出宣傳的思想是撥亂世，反諸正，大義滅親，要求對亂臣賊子毫不留情地進行鎮壓。其矛頭是針對諸侯王的叛亂活動的，目的是強化中央集權

²¹ 對此我們最熟悉的文章大概是柳宗元「桐葉封弟辨」開頭部分描述的成王與叔父周公間的對話：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古文觀止》（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494頁。

²² 《漢書·宣帝紀》，237-237頁。應劭在注中將暴室解釋為宮人的監獄，顏師古則認為是給布匹染色的部門，因要將布匹在日光下晾曬，所以用了「暴」字，後者顯得更具有說服力。兩者都認為是地位低下的下屬部門。嗇夫為暴室的屬官，也是一個極其低微的小官，這體現了宣帝青年時期的處境。

的等級制度的權威。這種法治精神盛行的結果，一方面加強了中央的專制集權和大一統，但同時也使宗法倫常，溫情脈脈的一面大為削弱，以致不僅淮南獄廣事株連，空前殘酷，最後連武帝父子之間也以兵戎相見，骨肉情思掃地以盡。宣帝精於政治，看出了一味強調法治的弊端，所以雖然強調法治，但儒家思想的另一面：重禮義教化，重宗法情誼，他也是十分重視的。這是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需要，也是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的需要。而和董仲舒的公羊學相比較，穀梁春秋正是強調後一方面的。所以穀梁春秋受到重視，是形勢的變化造成的。²³

金春峰認為宣帝深思熟慮，召開石渠閣議的目的在於「撥亂世，反諸正」。換而言之，就是緩和各方面的矛盾，強化自身的皇權。這種宏觀上的分析顯得非常具有說服力。但仍感覺並不十分透徹。每個皇帝都渴望實現自身的統治長治久安，如果這樣的目的只想通過經學大討論會來實現的話，皇帝則未免顯得過於「善良而純真」了。可宣帝並不是一個如此「善良而純真」的皇帝。上面我們已經談到，青年時期所經歷的種種坎坷使他擁有了非凡的政治頭腦，讀一下《漢書·紀》下面的內容，更能夠對宣帝有一個深刻的了解。下面引用的是宣帝與後日成為元帝的太子之間的對話，〈元帝紀〉開始的部分記載道：

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²⁴ 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²⁴

因為這段不算很長的對話，宣帝原本有心立下淮陽王為太子，可與太子的生母是在宣帝地位卑賤時結下的夫婦，如今已成為一國之君，所以無法實行。²⁵太子的話是父子之間對話常見的內容，而且合情合理，但卻因此使皇

²³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324-325頁。

²⁴ 《漢書·元帝紀》，277頁。

²⁵ 這種情況可以根據與「七去之惡」相對應的「三不去」來考察。「七去之惡」與「三不去」在漢代已經成為必須遵守的婚姻規則，內容出自於《公羊傳》莊公27年何休的注。「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而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許氏的遭遇符合第二種情況。參見韓養民、張來斌：《秦漢風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54頁。

帝產生了廢太子的想法，可見宣帝反儒家思想傾向是根深蒂固的。從《漢書·蕭望之傳》下面的記載中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些宣帝的政治傾向。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特故事，不從望之等。²⁶

以上兩段內容，充分顯示宣帝並非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我們有必要再仔細了解一下宣帝內心真實的情況。雖未直接表明，但他的內心似乎有需要解開的心結，對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考察一下宣帝登基前後的情況，大致可以推測出昌邑王被廢事件大概是造成他內心關於自身皇位正統性這一心結的原因。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距離宣帝繼位很近，《漢書》對這一事件的記載較為簡單。昭帝死後，大將軍霍光等擁戴昌邑王繼位，但登基不過 27 天，就因為其淫亂行為被廢除。這一事件與宣帝並沒有直接的關係。²⁷ 宣帝經歷了人生的風風雨雨，人生的軌道最終得到逆轉，在其他人的扶持下替代他人登上皇位，心中必然會產生一些忌諱，而這些忌諱很容易轉化為對自身正統性的不安及對周圍的懷疑。於是宣帝登基后曾派心腹秘密探訪昌邑王，在得到昌邑王並不是需要警戒的人物的報告后才安下心來。從這一舉動我們多少可以了解他的內心。²⁸ 這種情況下，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人而不在於制度。於是皇帝提拔了一批篤實信奉《穀梁春秋》的學者，並擺出支持「學問」的姿態。但其最終的目的則在於，將這些研究含有對自身有利內容的《穀梁春秋》學者拉攏到自己身邊。或許是希望在這些人的幫助下解開自己的心結。臺灣學者林啟屏考察了昌邑王被廢事件對宣帝造成的心理負擔，並以此為根據對舉行石渠閣議的動機做出了解釋，筆者較為讚同他的見解：

是故配合上宣帝繼承帝位的曲折來看，昌邑王的廢立事件，雖已事隔十餘年以上，但始終是宣帝心中的重擔，宣帝只有徹底地培養一群順服己意的學者，來取得自己繼承帝位的經典詮釋之發言權，才能真正解決自己在「宗法」繼承上的尷尬局面。這應當才是石渠閣會議產生的真正原因。²⁹

²⁶ 《漢書·蕭望之傳》，3284 頁。

²⁷ 《漢書·武五子傳》記載了昌邑王劉賀成為喪主，由於在前往未央宮的路上所作出的幼稚的行為而最終被廢的過程，2764-2765 頁。

²⁸ 《漢書·武五子傳》中班固描述了宣帝派山陽太守張敞密探接到報告之後，寫到「上由此知賀不足忌」，詳細內容見 2767-2768 頁。

²⁹ 林啟屏：〈論漢代經學的「正典化」及其意義〉，《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三) 石渠閣議的影響

石渠閣議的結果，表面看來只是將過去幾種未被設為學官的經傳增設為博士，但石渠閣議所帶來的變化及對後世的影響可謂極大。其影響可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皇帝開始「稱制臨決」。位於政治權力最高峰的皇帝親自籌劃討論會，參與討論會是理所當然的。經過周密籌劃的大討論會，經傳不僅得到了學術上的驗證，也獲得了最高政治權力的尊重，自此開始的「稱制臨決」可謂是完成經傳神聖化的必經程序。由於最高政治權力的支持而使經傳神聖化，不僅意味著政治對學術的介入，也潛藏著學術界主動向政治招手的可能性。由此，政治與學術健全的緊張關係，即政統與道統相互對立牽制的關係被打破了。³⁰這一點可以說是「稱制臨決」對後世留下較嚴重的影響。「稱制臨決」創造了學術主動向政治權力靠攏，得到皇帝的承認設立官學，由此學者們得以參與權力的構架。政治權力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這種紐帶關係一直延續到清末。這可否說是傳統社會知識分子的悲劇的一面？打著實現思想與學問一統的旗號，對此加以政治權力的介入與壓制，逐漸成為一種世俗的慣例。而這種慣例可以說是始於「稱制臨決」。

第二，與最初的實現學術思想統一的目標正相反，石渠閣議成了造成經學派別分化的開端。³¹我們無法判斷，經學史上所說的師法與家法的分化到底起於何時。錢穆則認為石渠閣議之後經說開始分家。

使大臣平奏其異同，而漢帝稱制臨決，此即整齊歸於一是，永不欲再有異說之意也。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者，凡此諸異說，雖與當時朝廷博士說經不同，而亦自可存，故許其與博士說並存，亦立為博士。夫然後說經者，有漢帝稱制特許之異說。如施博士說易以外有梁邱說，歐陽博士說書以外有大小夏侯說。公羊家說春秋以外有穀梁說是也。當穀梁未興以前，漢人言春秋即指公羊，因公羊以外春秋無別家。例此為推，未有大小夏侯，歐陽尚書只稱尚書，無須別號歐陽。施易只稱易，不必別目施易。然則漢博士經說分家，起於石渠議奏之後，其事至顯矣。³²

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2年），231頁。

³⁰ 關於政統與道統的相互牽制與對立，見拙稿：〈清代初期考據學興起的政治背景〉，《中國語文學論集》第33號（Seoul：中國語文學研究會，2005年8月），476-481頁。

³¹ 周子同指出「石渠會議漢武帝以後又歸於一是的主要的討論會」。筆者認為這是對這次討論會最初意圖的評價，其結果則是使經學通過分化而多元化起來。

³²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196

換而言之，石渠閣議是經學史上所謂的由師法轉向家法的契機。武帝至宣帝的 80 多年間，西漢的經學體系的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武帝時期的五經博士擴大為宣帝時期的「今文十四博士」。³³石渠閣議所引起的經說的多元化現象在經學發展史上可以說得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由嚴格的師法分化為自由的家法，為經說更加周密化創造了空間。更進一步講，唐宋時期經與經說能夠擴大為十三經與十四經等也都得益於石渠閣議。以石渠閣議為開端的經學的擴展，也為不久之後西漢末不可避免今古文論爭，埋伏了導火線。

第三，如魯學齊學之間的對立所顯示的，由石渠閣議起，各學派勢力為了各自的利益逐漸集結成集團，出於感情上的排他主義傾向日益顯露出來。如果這種緊張關係是健全的，對於各學派間多種經說的競爭與發展是極為有利的，這為後世學說間的交流與融合創造了條件，可以視為防止學問陷入僵化的一個突破口。更重要的是，作為中國學術兩大源頭的官學與私學，不斷相互轉換，保持兩者間的緊張關係，相互牽制克服，這成為學術向前發展的原動力，能夠充分顯露出代表一個區域的地域學的特色。但要想實現這些，其前提條件為各集團間論爭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獲取更多的個人利祿。

四、結語

本稿以西漢宣帝甘露年間舉行的石渠閣議為中心，考察了當時社會學術狀況的變化，大討論會召開的目的動機過程結果以及對後世的影響等。內容可以做如下整理：

第一，石渠閣議與鹽鐵會議同樣體現了西漢時期政治學問的氛圍，漢武帝施行的「百家罷黜，獨尊儒術」政策為其出發點。

第二，武帝以後博士與博士弟子員的數量大量增加，經說日益變得複雜，政治及社會要求重新對經學「一統」。

第三，武帝時期公羊學占絕對優勢，因正統性問題，宣帝則偏向於政治上對自己有利的成分更多的穀梁說。

頁。此論文雖然發表於 1943 年，但於前此 14 年，1929 年發表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中已披露出相同觀點。同上註，16-17 頁。

³³ 據《漢書·儒林傳》，武帝在設立五經博士時，《書》只有歐陽，《禮》只有后倉，《易》只有楊何，《春秋》只有公羊。到了宣帝，經說變得極為豐富。《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書》有歐陽高、夏侯勝、夏侯建三家，《禮》有大戴（戴德）與小戴（戴聖）二家。《春秋》除了嚴彭祖、顏安樂二家，《穀梁》也被設立為博士。加上原來被設立為學官的《詩》三家，共 14 家。「今文十四博士」不包括《穀梁春秋》，而加如了元帝時設立的京氏《易》。

第四，在宣帝十幾年的大力獎勵下，於甘露 3 年石渠閣議得以舉行，皇帝「稱制臨決」有意識地參與其中，穀梁學逐漸佔據優勢被設立為博士。

第五，宣帝做出如此選擇表面看是出於對祖父戾太子的一片孝心，但更重要的是為減輕對被廢掉皇位的昌邑王的負擔感，同時培養擁戴自己的學者，解決帝位繼承的正統性問題。

第六，「稱制臨決」是政治權力介入學問與思想的前例，推翻了政統與道統間健全的緊張關係，成為剝奪學問純粹性的開端。

第七，與所期待的經學一統相反，此次論爭成為由師法分化為家法的決定性轉機，經說變得更加多元化。

學問的生命力源於自身的不斷變化。學問、企業、政治均如此。石渠閣議給予後人最大的啟示在於為經說的自由化多元化發展創造了契機。可問題是，皇帝肯定的評價，或「許可」被採納為學官「正式的教科書」，變成教條的經說，到了東漢時期這種問題並未得到改善，而導致了東漢「白首而後能言」一門經的章句學的弊端。這再次表明，沒有新鮮的外部學問的滲入和自身不斷的探索，任何學問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失去其發展的動力。

雖然可以斷言一部分學者對學問持有剛直客觀的態度，但如果一旦皇帝表明了自身的立場，參加討論會的學者則一定會受到其影響。石渠閣議向我們證明了無論目的多麼壯觀又漂亮的討論會都會因擁有特殊身份的皇帝一人而受到學術以外因素的干擾。這裡不能不考慮到政治權力與學問或良心的關係。我們也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皇帝政治權力的介入，只討論如何來選拔博士的話，討論會會不會有更為圓滿的結果？在古代中國如果沒有皇帝政治權力的介入，有可能得出最終的結論嗎？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深刻的自我反省。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漢〕班固：《漢書·昭帝紀》、《漢書·宣帝紀》、《漢書·元帝紀》、《漢書·武五子傳》、《漢書·蕭望之傳》、《漢書·儒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唐〕柳宗元：〈桐葉封弟辨〉，《古文觀止》，臺北，三民書局，1982 年。

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78 年。

- 邢義田：〈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
- 林啟屏：〈論漢代經學的「正典化」及其意義〉，《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2年。
-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
- 章權才：《兩漢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
- 黃彰健：《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
- 劉宗賢、謝祥皓：《中國儒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
- 韓養民、張來斌：《秦漢風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李世東：〈石渠閣經學會議에 대한 一考察〉，《中國語文學》第43輯，中國語文學會，2004年6月，서울.
- 拙稿：〈清代 초기 考證學 발전의 정치적 배경 연구〉，《中國語文學論集》第33號，中國語文學研究會，2005年8月，서울.